

臺灣社會學刊，2006年12月
第37期，頁1-31

理事長演講

社會學與公共影響力： 新政策社會學的願景

蔡明璋*

* 蔡明璋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mtsai@mail.ntpu.edu.tw)。

中文摘要

台灣社會學界應該更積極進行政策社會學的研究，以提升社會學的公共影響力，避免因為過度追求專業化而將這門學科鏽上自我規訓與社會隔離的鎖鍊。本文討論公共社會學與強勢專業社會學兩個範型的問題，並指出社會工程學的可行性。政策社會學在台灣所面臨的經濟學霸權與官僚情境的限制，文中亦加以分析。社會學家可以積極的跨越實證研究者的角色，在合理的理念基礎上，提出規範性的制度創新。最後提出新政策社會學的六個命題，作為倡議政策研究的願景。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ember 2006, 37: 1-31

**Sociology and its Public Influence:
The Vision of New Policy Sociology**

Ming-Chang Tsa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ddress encourages sociologists in Taiwan to engage in policy-oriented researches to increase social influence of this academic discipline. We had overstresse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such that the consequent self-disciplining and social isolation had generated severe backlashes. This paper criticized two potential proposals — public sociology and strong professional sociology — that aimed to obtain social popularity for sociology. It is contended that there exists favorable potentials from social engineering model. Moreover, obstacles that policy sociology might encounter in Taiwan, mainly dominance of economics and bureaucratic hurdles, were detailed. Sociologists can play a more positive role by proposing innovative institutions that are norms- and reason-based. In conclusion, six theses of new policy sociology are presented to manifest a vision of new policy sociology.

4 臺灣社會學刊

我們企圖研究的是所有的事實，這並不說我們如此就應放棄改善它的想法。我們的研究興趣若僅是思考，我們會認為它不值得花費一時半刻的力氣。我們仔細的分辨理論與實務問題，不是爲了要將後者置之不顧。相反的，這是因爲我們要讓自己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以便來改善它。

——引自 Durkheim(1984:xxvi),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第一版序

一、被忽略的社會學?

在過去 20 幾年來，台灣的社會學界致力於將社會學的研究提升到一個專業化水準的同時，社會學這門學科的影響力同時也陷入擴張不足的困境。在知識的抽象與深化，研究領域的管轄權的確立，與研究成果的出版上，社會學者集體努力建立相當可貴的成果。台灣社會學在專業化這個層面上付出相當大的努力，企圖在研究社群中產生顯見而有效的知識傳散。這個傳散的過程，可以用兩種模型來加以理解。第一種是研究成果產生的「特定性的」解釋力，研究者的理論創造或是經驗事實的發現，爲相同興趣的研究者持續參考。另一種是「實質性的」解釋力，非但力道持續，甚且在其他的研究領域中亦引發大量使用其理論邏輯與基本概念。¹從 1980 年代初期起，台灣社會學者提出本土化研究的觀

¹ 做這個區分時我參考 Rule (1997)。他認為評估社會科學的理論進步，應仔細的區辨所謂的「形式的進步」(formal progress) 與「實質的進步」(substantial progress)。在前者，知識的成果是侷限於「內在」的圈子，而後者有能力吸引更多外來者、甚至是大眾的興趣。

點，在方法論的反省與研究議題的發掘，產生相當有意義的成果，在企業、族群、社會運動、階級、家庭、性別、發展等重要研究領域，²所累積的文獻，已經達到一個相當充實的水準。同時，社會學者也利用許多國外學者的重要理論觀點，包括社會／文化資本（Coleman 1988）、鑲嵌的社會行動（Granovetter 1985）、網絡（Granovetter 1973）、依賴／世界體系理論（Frank 1969; Wallerstein 1974），結合（而非僅是複製）到台灣社會相關的研究，這些成果值得鼓勵。

但是，一般社會大眾對這個研究他們的社會科學學門，僅有非常微弱的信息。到社會學系甄試的學生，常說他們的主要動機是要為社會孤苦無依的人提供更好的幫助。社會學系的主任開學的第一個難題常是回答學生家長的質疑，社會學系是否能為他們的子女在職場上爭取到高薪穩定的工作。在社會學系讀了一年，想轉系的學生都比轉進來的學生多，我們提不出充分的理由留住想轉到法律、會計、企管系的學生。

多數的綜合大學，不設社會學系。既使大學裏有社會科學院，成立社會學系的比率極低。在150所大專院校中，只有10個「正牌」的社會學系（含所），一個社會學研究所（清華大學）。一些學校將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放在同一系（例如高雄醫學大學），許多其他科系的教師不斷的搞混社會學與社會工作，我們隨時要解釋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的學門，如何與社會服務有所不同。社會學專長背景的同仁，在大學通識中心任教的比率高於在社會學系內，而許多學生認為通識科目不過是理工主修課程以外尚稱好玩的副食品。許多學生將社會學科目當成「營養學分」。

當傳播媒體需要有學者對社會結構與變遷提供專業的觀點時，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法律學界的同儕，總是比社會學者更常是諮詢的

² 這些文獻相當多，為省篇幅，不一一徵引。

6 臺灣社會學刊

對象。即使是嚴肅的、不打口水戰的談話性（或「知識性」）節目，也不常見社會學家受到邀請。即使社會學者有機會發言，我們所表達的觀點的受觀迎度或受信任度，甚至也不如一些沒有堅強證據、大放厥詞的社會趨勢專家。幾周前，《商業周刊》訪問我，討論大前研一的新書《M型社會》的論點。他預言中產階級將要消失，台灣80%的人口將淪落到「下層社會」。我回應這是毫無根據、沒有價值的臆測，至少目前為止，台灣的中產階級的穩定收入目前並未受到嚴重的威脅。雖然記者答應將我的意見納入報導，當期周刊（986期，95年11月）實則完全不提曾經與我這個社會學者討論過相關問題。在台灣，要知道那些人最可能有穩定的收入，那些人會因工作勞累過度損壞健康，或許有更多人會參考星象大師提供的星座預言，³很少人會去看社會學的研究成果。

我們可以說社會學界的「公關」（PR）做得很差，與社會，特別與是大眾媒體打交道，原本就不是孜孜於學術、少與外人交往的社會學者能做得很好的。那麼我們來看看社會學者在社會科學界內部的知名度。台灣社會學研究的影響力，透過一些所謂的隱形學術社群相互引用彼此的研究成果，不過社會學社群規模不足、研究領域分散，致使互動密度不足（蘇國賢 2004），易言之，研究的「實質影響力」不免有限。根據蘇國賢（2004）對於國內社會學論文引用模式的統計，TSSCI論文引用社會學者的文獻平均為2.25篇，引用國外文獻近30篇（統計至2002年）。社會學社群內部互動不足，也影響到論文被引用的頻率。我計算TSSCI資料庫的情況顯示，2000-2005年間《台灣社會學刊》被引用的

³ 〈你能拼得到現金嗎？〉、〈誰過勞死的可能性最高？〉。Yahoo!奇摩星相頻道，<http://tw.astrology.yahoo.com/article/url/d/a/061031/231/3lvvr.dbf>，取用日期：2006年12月8日。

論文僅有 10 篇（作者自引不算），這段期間所出版的正式論文共有 72 篇，引用的比例僅有 14%。《台灣社會學》面臨同樣乏人問津的窘境。在 2001-2005 年出版的 57 篇的正式論文中，僅有 7 篇論文被其他論文引用，引用的比例是 12%。台灣社會學界所推出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內部（社會學界）或外部的圈子未能產生足夠的影響力。社會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的重要學科，在台灣的發展可以更好，但事與願違。教育部、行政院採取的緊縮、凍結政策，沒有大學要增設社會學系。相對的，裁減社會學系的「勝算比」相對是較高的。我與在座的各位相同，大部分是任教職的教授，不會受到這些空頭趨勢的影響，可以享受到不錯的中產階級水準待遇（這是為什麼大前研一誇張而且錯誤的理由之一），一輩子安心地、自由地做「有趣的」社會學研究。我們雖不是瀕臨絕種的動物，但是絕對是稀有的學術品種，正被逼到社會的角落。

今天是台灣社會學會的 2006 年會，同時，今年又是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成立 50 周年的大日子，非常高興台灣社會學會有這個榮幸能在大度山辦這麼一場難得的年度盛會，我演講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說一堆令人心寒怯志的話。相反的，我要藉這個機會，與大家討論台灣社會學的一個問題：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的專業科學，面對這麼低的社會影響力這個社會事實，我們未來的進路應是什麼？

二、拯救社會學——公共社會學與強勢專業社會學的方案

（一）公共社會學的可能性

社會學在公共領域僅是扮演邊際者的角色，這個困境並非僅發生於

8 臺灣社會學刊

台灣，Michael Burawoy以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的身份提出「公共社會學」的計畫，亦企圖為美國的社會學「在陽光下爭取一個地方」（2005a: 5）。⁴根據Burawoy的說法：「公共社會學將社會學帶引入與公眾進行對話，……一種有機的公眾社會學中，社會學者與一個看得見的、厚實的、積極的、在地的、而且常是反對性的公眾親密連結，一起合作」（2005a: 7）。公共社會學的特色是將社會學導引入共公的論述，與群眾進行一場社會學的對話。在公共社會學的理想型中，社會學的閱聽眾，不是學院裏的專業研究者，而是市民社會的諸多群體（Burawoy 2005a），它將廣大的公眾群體帶入嚴肅的對話，商討社會的理想、價值、現況、未來趨勢、問題、危機與可能的解決。⁵ Burawoy認為公共社會學應是有機性的，將社會學帶入群眾，與群眾的生活、命運、困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相較之下，傳統的公共社會學，試圖與公眾對話，但僅限制在特定的媒介，例如全國性的報紙，或是有興趣的閱聽人。在這裏，公眾是隱形的，被動的，是不明確的「主流社會」（mainstream society）。這種公眾社會學，像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⁶

⁴ 無獨有偶，美國的Pacific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2005年年會中，理事長的演講主題也從社會學的理论與實踐的關係出發（Schwartz 2005），但主要是討論社會學者作為公共的知識份子的應然性。

⁵ 公共社會學本在英語世界的脈絡下，Burawoy舉出的例子包括W.E.B. Du Bois, 1903, *The Souls of Black Folks*; Gunnar Myrdal,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David Riesman, 1950, *The Lonely Crowd*與Robert Bellah et al., 1985, *Habits of Heart*等人的相關著作。嚴格的說，這些論述的訴求對象，是一般性的知識份子，與Burawoy所要「求諸於野」的市民社會，有相當一段的距離。

⁶ 不少社會學者在大眾媒體的諸多空間，對台灣社會的變遷與改革提出批判的觀點，在意義上亦是公共社會學的一種範型，他/她們作為批判的知識份子更勝於社會學者的角色。瞿海源與蕭新煌兩位教授在這方面的努力，顯著的提升社會學者的

Burawoy 的計畫是將社會學與群眾的距離拉近，主要的方法是進行一種理念的溝通，直接面對群眾，在學院的高牆之外，另搭起一個群眾論壇，與市民社會共同理解生活經驗的歷史脈絡，共同就政治與道德意識進行對話，一起關懷人類的普遍利益。Burawoy 這個計畫的終極價值令人尊敬。不過這個策略的可行性（與可能性），引起許多學者的質疑。

Burawoy 相信有一群社會成員願意聽社會學者的發言，社會學者要與這群人建立起一種有機的連帶：勞工運動，街坊組織，移民權利團體，人權組織（2005a: 8）。整體而言，這些是 Burawoy 所謂想像的「市民社會」。Burawoy 很明顯的是在一個左派的架構下將社會學與激進民權團體「送作堆」。他終極的計畫是倡議全球性的公眾社會學（global public sociology），這個計畫需要一種「共享的集體意識」（主觀的「階級意識」？），以「市民社會的觀點，反抗威脅人類生存的市場專制」（Burawoy 2005b: 159）。Burawoy 的想像將許多重要的社會元素對立化。公共社會與國家、與資本是敵對的（Turner 2005）。這種左傾的教條主義，忽略了一個歷史事實－社會進步是在多方妥協下達成的（Gourevitch 1986）。

就學術社群的動態而言，Burawoy 的社會學分工架構，⁷極易導致

能見度（瞿海源 2002；蕭新煌 2002）。值得一提的是，2005 年出版的《凝聚台灣生命力》（王振寰、章英華編 2005），著書立說以招來大眾讀者，亦是這個方向的另一個努力。這本書是台灣社會學會與扶輪社合作的成果，分析當代台灣社會動力，試圖指出社會關懷與社會團結的可能基礎。我們社群成員出了教室所做的課外活動，大都是扮演著傳統的公共社會學者角色。

⁷ Burawoy（2005a）以工具相對於批判的知識，學院內的相對於學院外的閱聽眾兩個向度，交叉形成四個象限的社會學，包括專業、批判、政策、公共社會學。本文不討論批判社會學這個象限，但不表示它不重要。這種批判／反思的社會學，致力

強調社會學門內部的分化，加深公共社會學與其他社會學者的對立。單純的發聲變成了「嗆聲」。公共社會學成為感覺很爽的民粹主義（Calhoun 2005）。學術分工、分化、立場的對立，在台灣的學術界中並非不常見。社會學分工轉化成為一種類似原生身份的認同，加深文化斷層線，產生的敵意與怨懟或許多於連帶與團結。近似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公共社會學，在社會學社群內部被接受的可能性並不高（Boyns and Fletcher 2005）。

公共社會學在社會學社群以外，亦不保證一定有票房。在台灣的脈絡下，不少社會學者的研究，的確得到與工會組織的幫助。這些組織與社會學者的淵源，常是立基於私人關係。台灣社會學會作為一個學術團體，與激進組織的關係一向不深。一個原因是，激進左派的立場，與一般社會學者的觀點距離頗遠，更不用提他們與台灣社會大多數民眾的想像相隔的空間。倡議公共社會學，不免將社會學政治化。譚康榮（2003）的比喻值得深思：在高度政治化的台灣社會，這種號召群眾的社會學，所高舉的一種特定的社會道德，常轉化成為難以馴服的野獸，反過來傷了主人。公共社會學原意要開疆擴土，廣招來者，可能的結果是將社會學推入一個更乏人問津的死巷。

於挑戰專業社會學研究的哲學基礎（Burawoy 2005a），在我們的社群中亦頗活躍，所產生的衝擊力不容忽視。在台灣，葉啟政教授（2001）是這個象限的代表人物。他痛斥台灣社會學以「專業掛帥」的意識型態，過度膨脹解釋社會現象的權威與合法性。台灣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亦步亦趨的移植性格」，「幾無具原創風格」，猶如「門面愈大、但深度卻未加深的盤子，膚淺但卻熱鬧滾滾，刺激無比」（2001: 99）。葉啟政指出理論與實證研究可以採取一種由下而上的進路，有效的掌握「本土特殊的思惟與行事理路模式……涉引到本土傳統文化對人及社會世界的哲學家類學上基本存有預設」，可以貼近他所謂的本土、反思的社會學研究。

在台灣，建立在訴求群眾的社會學復振運動，其結果尚未可知。在《台灣社會學會通訊》（2003）第53期的專題，以〈公共社會學的反省〉作為專題開始。在2005年的社會學會年會上，顧忠華教授（2005）的理事長演講也力倡社會學的「開放性」（亦即超越狹隘科學主義的典範）與「公共性」（亦即增強社會科學知識的不可或缺性）。至目前為止，這些活動與反省也侷限在少數大學的社會學者身上，未擴展到更多的社群成員，遑論社會學圈子之外的學術社群。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我所討論的一些限制，可以解釋公共社會學的實踐所遭遇到的限制。

（二）強勢專業社會學的典範

在批判公共社會學作為擴展社會學影響力的同時，許多社會學者提出專業社會學是另一種可能的路徑。Burawoy並不否認專業社會學的重要：「專業社會學不是政策與公共社會學的敵人，而是其存在絕對必要條件（*sine quo non*），提供合理性與專業技術給後者。」（2005a: 10）；「專業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之間，應有（也常有）相互尊重與綜效（*synergy*）」（2005a: 15）。理想上，專業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可以產生密切的關係（Burawoy並未進一步細述這個情境與可能的機制），在現實上，他所謂的「病態」的專業社會學者以發展學院派的生涯為主，經營細微的、瑣碎的研究議題，操作各種經驗分析的技術，陷入一種方法論崇拜的境界。在Burawoy社會學分工架構中，專業社會學以實證科學作為防衛機制，建構了一種科學的專制體制（2005a: 18），將其他層次的知識批判或政策研究，壓抑到低等、從屬的地位。Burawoy認為，專業社會學所提供的工具知識缺乏一種類似韋伯的所謂的「魅力」，在價值中立的迷思下，縮卷在專業化的自我世界，作繭自縛，是它未能成就公

共影響的主因。

專業社會學本身不能成爲提升社會學影響力的範型嗎？Turner 可以說是批判 Burawoy 的社會學公共化最嚴厲的學者。Turner 同意社會學缺乏社會影響的嚴重事實。不過，他的歸因是社會學的專業化的力道不足。他的論點是社會學內部分化的過度，「太過異質性，太容忍任何想法，太包容，太過沈耽於政治正確與認同政治，太濫用任何能拯救我們的（科學的）任何取向，我們太沾沾自喜於這些異質性對我們的學門有其助益的想法」（Turner 1995: 39）。Turner 不是倡議一種一言堂的社會學，要大家的想法一樣。問題是社會學者的研究不足以提出一個一致性的結論，外界的聽眾對這種情況感到莫衷一是。如果連社會學者內部對於社會現象的解說，都是南轅北轍，如何要外界的人來相信？Turner 提出的另一點，如果改善社會的權力，掌握在政治菁英或經濟菁英手上，那麼社會學者選擇與激進運動群體結合，全然是不符合理性邏輯的行動。社會學只是建築一個堡壘防衛自己而自外於社會。

他的解決方法是，讓社會學像經濟學的知識整合爲一。我也要批判這個有趣的論點。關於社會學知識的整合，Turner 的想法是「知識上具一致性的學門，才能發言時統一而有力」。他的例子是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的優勢典範。從社會學的觀點而言，經濟學對人類行爲的解釋，是極爲偏狹的，縮卷在一個想像的有限社會空間中（我指的是以各種人工化的條件設定，排除不符經濟理性因素的影響之後的構思）。然而，Turner 認爲正是這種統一的發言口徑，讓經濟學在生產與分配相關議題，或是政治與公共事務的議題上，取得了極強勢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相對而言，「社會學在認識論與研究主題上缺乏共識，而受到嚴重的損傷」（Turner 2005: 37）。

我懷疑社會學是否真的適合或應該以經濟學作爲模範，讓社群內講

同樣的語言？回顧社會學作為科學的歷史發展，並不是採取統一而是鼓勵另闢途徑的方式，與經濟學或政治學對話。的確，我們習慣於「另類的思考」，也相信不同的思考角度本身極具有重要的人文意義。不同的觀點並非「失序的」或是「混沌的」(chaos) 無政府狀態，如 Turner (2005: 38) 所批判的那樣。社會學不能、也不應發展成經濟學那般的一言堂。為了增加社會學影響，而自願囚禁在單一化的知識牢籠裡，這種近似出賣靈魂的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並不高明，實際上也不可行。

Turner 所謂的統一口徑的另一層可能的意義，如果是社會學者應在基本的社會問題上累積足夠的、可信的研究成果，透過集體的討論（出版審查亦應是這個過程的一個要角），提出一個能夠「共享的」知識，那麼社會學對外的發言口徑，可以是一致的。不過，台灣社會學界對於社會諸種議題的研究不夠密集，累積的基本知識還是不夠。真正能共享的知識，其實頗為有限。從「另類思考」演變到「共享知識」，是一段漫長的、考驗耐力的路程。

三、政策社會學作為社會工程的模型

社會學或許可以考慮 Turner 另一種社會工程學的模式。如果有人將社會問題拿來請教社會學者，社會學者可以做的是提供專業知識，修補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作為社會工程師，社會學者成為理解社會問題癥結、可以提出具體辦法的技術專家。社會工程學的重要論點是，如果社會學要發揮應有（應得）的社會影響力，它必須展現出它的實踐力，他的專業知識能解決什麼樣的公共問題，或至少提供具體有用的建議。這種問題解決的取向，帶有的實用性格，但是實用性並非一種原罪。

在社會工程學的模型中，政策研究者主要的工作是為特定「案主」

提供知識的服務，這些案主包括政府、企業組織或是非營利團體。後者給定的特定問題，請社會學者提供可能的解決，或者供應相關的知識作為諮詢。政策社會學相對於理論研究，著重於「行動」，強調的是「效用」(Coleman 1978)，這時社會學者的工作是發現實用的知識。通常的情況是社會學者與政府訂定契約，政府提供一定的研究資助金額，社會學者將相關領域的知識移用並轉化成為可行的政策建議，或是更具體可行的施政措施。

在台灣社會，近似社會工程學的例子，包括從1960年代的家庭計畫，到1990年代的教育改革政策和社區總體營造均屬之。目前，不少社會學者參與的審議民主計畫，也可以說是政策社會學的一環(林國明2003；林國明、陳東升2003)。嚴格的說，社會學者參與這些社會工程的機會，並不是那麼多，儘管社會學的專業知識累積越來越多。社會工程學的實踐，必然是依賴外在力量(通常是國家)的徵召，與提出問題的案主，一起合作。這種情境暗示，社會學影響力的建立，不能自主的完成，但這不一定要解讀為社會研究者作為社會工程師將失去主體性(這點容後討論)。社會工程學意謂著社會問題的解決，需要進行一套頗為複雜的社會互動過程，是一種長期演化的過程，就像是社會學知識的累積一般。政府或社會大眾力量不可能在一夕之間發現社會學的作用。以社會學知識的進步有限性而言，我們也未能達到那個地步。社會工程學的步調，比起急進的公共社會學是慢了許多。套句俗話，「在穩定中求成長」。

社會工程學是專業社會學的延伸。社會學先穩定的將自己建構為一個核心的社會科學，接著再努力設置一個社會工程次領域，利用科學知識解釋社會現象，「解決」⁸我們的案主—政府或公眾組織—交付給我們的社會問題，當作是我們的實踐作業。社會工程學，是「強勢專業」

(strong profession) 與「弱勢政治」(weak politics) 的結合體，個人的意識型態和黨派取向不應是視為理所當然，而是有意識的壓抑 (Turner 2005)。在政策社會學的研究中，價值的影響並未消失，通常會更為強烈。這點我們作為社會學者曾進行深刻的反省，我們比其他學科更深刻的經驗到價值中立的困難度 (Weber 1949; Gouldner 1962)。社會學 (或社會科學) 的科學技藝，不能無限上綱到作為指導社會改革的倫理或終極價值。在工具層次上，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實用力，這樣的力量如果「備而不用」，社會學與公眾同樣受損。但是，在價值目標的層次上，如同 Weber 所說的，社會學者的地位，不過與其他一般人相似而已。

四、當社會學缺席時：政策研究的科學霸權

就利用厚生的角色來看，政策社會學沒有理由不受重視。實際上，在台灣的社會學界，政策研究比起公共社會學更少得到重視。我的評估是，這是社會學社群集體用力最少的領域。即使是與政策社會學關係密切的貧窮研究，⁹ 亦常採取的抽象理論和複雜的分析方法，專業社會學的意味大過政策社會學。的確，社會學家曾做過關於教改的政策研究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 1996；蔡瑞明、林大森 2000)，其影響力亦缺乏更精確的評估。大致而言，「政策社會學」作為專業領域，幾乎是「有行無市」的窘境，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⁸ 「解決」這個字眼的意義太強，Weber (1949: 51) 在面對類似的情境時，選用較保守的述詞，社會學者「揭露」社會問題，提供可行的技術判斷問題。

⁹ 請參考張清富 (1993)；蔡明璋 (1996)；呂朝賢、王德睦、王仕圖 (1999)；陳正峰、王德睦、王仕圖、蔡勇美 (1999)。

相對的，在社會議題相關的政策研究中，經濟學的優勢地位是不可忽視的。經濟學以新古典主義的架構，基本的特質是靜態的分析，假設在某種條件或資源（財政、資本、勞動、土地）的限制下，所應（可以）做的最適當配置，以獲得最佳的效率。正統經濟學較少考慮動態的累積和發展對分配效率所可能產生的影響。這種規範的效率觀點所提供的知識，是在特定條件下的選擇。在理性行動的假設下，各個社會的制度特殊性成爲存而不論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規範前提，並不特別考慮社會學所重視公平、社會連帶、民主等啓蒙時代以人類所持續追求的價值，變遷與改革並非是經濟學模型內的重要變數。

令人焦慮的是，社會學者從政策研究領域退出來，而新古典主義的意識形態的主導勢力已進一步提升到一種帝國霸權的地位，對於社會的公共事務有完全、最後的發言權。就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台灣的經濟學者或許比美國更爲接近「右派」。至少，台灣的經濟學圈子容不下自由主義範型之外的異端。我舉一個例子。Henri Lepage 寫了一本頗受歡迎的經濟學「科普」*Demain le capitalisme*，天下文化在1988年曾出版，將原書名《明日的資本主義》改爲《自由經濟的魅力》，在市場上推銷傳統自由主義的想法：「市場經濟是最能達成個人滿足這個目的的手段」；「自由的擴張是促進福利與平等最有效的途徑，因而主張有限的政府以保障自由」（夏道平、馬凱、林全、吳惠林 1988）。社會學，特別是經濟社會學，對市場意識形態的批判，已經是我們這個社群所熟知的，我不再贅述（Trigilia 2002; Smart 2003）。我簡短的引用Polanyi的兩個論點來反思我前面講的經濟學論述霸權。第一，市場經濟是計畫出來的，鑲嵌在非常特定的歷史制度脈絡下。Polanyi指出，機器、原料、自由勞力以「商品化」買賣的形式制度化，一種「獲利」的動機在市場貿易的氛圍中獲得正當化的地位，取代分配或互惠的經濟規範。Polanyi

的歷史取向研究的結論是，市場能夠持續的以開放的形式運作，乃是國家有計畫介入的結果。第二，在市場機制過度操作時，他所謂的社會保護的力量經常出現，避免社會集體生活的根本基礎受到嚴重破壞而無法修復。Polanyi的例子包括工人運動，社會主義政黨，法西斯主義，新政／福利國家。不同的文化與社會脈絡引生的自我保護的反作用力是迥異的。我們的研究所認為這些論點是可以接受的命題，經濟學尊重但並不認同。

經濟學在各種公共事務上佔據最重要的發言台，解釋權牢牢的掌握在他們的手上。從政府政策的基本規範，到學術資源的分配，到中學社會科教科書所要呈現的觀點，都有新古典理論、理性選擇與功利主義模式的影子。關心公共政策的社會學者，不免要與這些經濟取向的政策論述進行爭辯。當然，其他學門研究者對社會事實的想像與評估所帶有的偏見，也常壓過社會學的想法。例如一份衛生署所資助的剖腹產研究報告，在理解台灣剖腹生產率（33%）高過世界衛生組織所建議的15%的現象時，指出產婦要求剖腹（不論是什麼原因）是決定性的因素之一，似乎過度的將責任歸咎於生產婦女。醫學研究者對於這種過度醫療化以及醫師處理剖腹的倫理（為了避免健保局核刪費用，以胎位不正申請醫療給付），則一筆輕輕帶過，對於醫療體制背後的權力與利益糾葛，缺乏深度的反思與制度改革的企圖。¹⁰

相對的，社會學對於各種公共政策的理性與道德基礎加以慎思明辨，這是我們這門科學的長處。我們所支持的價值和制度，特別是人道

¹⁰ 行政院衛生署新聞稿〈剖腹產知多少?〉，2004年2月10日；〈台灣剖腹產33% 世界第三〉。聯合報，2004年2月11日。謝謝吳嘉荅教授提供這兩項資料，本文的意見作者自負。

價值與社會理性，這些來自啓蒙時代的社會改革想法與理念，仍然是當代社會學研究者重要的遺產（Nisbet 1978）。儘管當下新自由主義的壓抑，以及學院派講究價值中立的要求，再加上台灣社會高度政治化的政策論述，我們在揭櫫價值立場時總是謹慎而有所保留。這並非是說社會學者的研究，不在乎終極價值的存在，對於性別、族群、階級、平等、權利議題的重視，我們更甚於其他學門。社會學社群長期的慎思，形成一種道德的傳統，所以支持這些議題背後的基本價值，認為它們在公共政策中應該有更清楚的呈現。

五、國家與政策社會學的關係：辯解、烏托邦、理性控制

國家的支持是政策社會學可以進行的最重要推力。政策社會學者與國家的關係，值得在此再加討論。傳統上，這個關係一直是處於緊張、矛盾的狀態。馬克斯指出政治經濟學家是布爾喬亞階級的科學代言人，作為一種既得利益的「辯解者」。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斯（Marx 2000）亦批判一群「烏托邦」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他們認為無產階級發展常不成熟，遂而放棄政治革命行動，企圖改用和平方式完成社會主義的計畫。在當代的政治體系中，辯解者猶如統治精英的政策化裝師，呈現知識在下與權力在上的位階結構；而烏托邦學者則遠離現實，高談闊論，捏造一種新的政策福音，與真正的改革大相逕庭。¹¹

¹¹ 在馬克斯的觀點中，社會科學知識的改革作用，似乎是相當有限的（Coleman 1978）。至多，馬克斯談到在固定資本成熟發展的過程中，知識（一般性的知識與技術）被轉化成為生產力的一環，而產生特殊的「貢獻」：「自然力量被社會知識（social intellect）所控制，這是勞動力工具（之有）生產力之先決條件，……社會生

在公共社會學的觀點下，Burawoy (2005a: 9) 對政策社會學批判的火力亦不稍減：「政策社會學是為案主所界定的目標來服務的。政策社會學的存在理由是問題提出來後，要提供一個解決辦法，或者給予已經想到的解決辦法合法性。」這樣的基本性格極易產生奴從性的病態：政策社會學太容易被案主掌握，案主為了一份契約，一筆研究費，被迫接受一些責任，扭曲研究的取向。社會學者委曲求全，一種極端的情況是沒有自尊的侍候性格 (servility) (Burawoy 2005a: 16-17)。

政策社會學者應有所警覺，避免成為既定政策的辯解者，陷入不當服從的情境。案主（國家）邀約我們進行政策研究，同時要求我們為不當的政策背書時，我們應該明快的拒絕，不參與這樣的政策研究。

政策社會學作為辯解與屈從角色，意謂了社會學知識對現狀的支持，所產生的「邊際效用」是相當有限的。在另一種情境下，政策研究的作用表象上是可以擴張學門的影響—政策社會學作為「理性控制」的工具產生顯著的社會作用。在這裏，國家的思考邏輯是，政策制定者可以從政策的施行與實驗，得到社會的回饋訊息，再據以修正政策的形式與方向。這種「社會實驗」的模型，想像社會是一個理性行動者，進行必要的自我調節 (Coleman 1978)。政策社會學者也常有意無意中接受這種模型，社會學知識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回饋過程中，擔任社會資訊的提供者的角色，幫助國家成為知情 (well-informed) 的決策者。

這個理性模型是否意謂著國家對社會改革的善意，社會學者有不同的解讀。Habermas (1970: 106-107) 的批判值得仔細的討論：

計畫性的建構社會的模型，是根據系統分析來的。根據這個自

活過程的條件遂為一般的知識所控制，並依其樣式而轉變」(Marx 1973: 706, 709)。

我規律的系統的模型，理解與分析個人與組織，甚至是政治與經濟次體系與整個社會體系，原則是可能的。……執行這種像是本能一般的社會體系的自我調控的意圖，……亦即是，在兩種行動中，目的—理性的行動這種行為體系，不僅是支配了制度架構，而且逐漸的吸收了溝通行動。……不論是在何處，這種技術意圖尚在初始階段，還未完成。但是，它的作用是新政治的意識型態，它因應著技術性的問題，同時將實踐的問題存而不論。再者，它的確相應於某種發展的走向，這種走向導致我們所謂的制度架構漸形消蝕。威權國家所明著來的支配方式，已讓位給這種技術—操作性的行政（technical-operational administration）的操弄驅力。一種規範秩序的道德實現，是導向共享的文化價值意義、應有價值內化的溝通行動的函數。但是逐漸的，它為制約性的行為所取代，這樣的大型結構愈來愈是以依照理性—目的行動來模塑。

Habermas 所觀察的政策研究，不僅是成為統治精英操弄社會的工具，而且化身作科技統治的理性行動，內化成為一般大眾的合理意識價值，打消社會的創造性的異議聲音。更重要的是他所謂的「制度架構」，一種建立在理想的語言溝通的民主政體，連帶為理性設計的力量所消解。技術成為國家統治的意識型態，而透過這個形式大眾社會被「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對於社會進步的方向，沒有置喙的餘地（Habermas 1970: 105）。

政策社會學轉成辯解者、侍候者，或是理性控制的替身，這三個模式並非不常見。這些批判性的觀點，提醒著社會學者涉入政策研究時所面臨的危險情境。社會學者更應該可以同情這樣的批判。這樣的討論國

家，並不是要將國家妖魔化（Brady 2004）。國家是一個內部複雜、各種理念與利益糾葛的統理機構。社會學與之合作，不是用全然可或不可這種二分法可以進行的。兩者的互動的可能性，是要看機緣性（contingency）的因素。國家或立法者可能是理性行動者，也可能是價值合理性的追求者，利益與規範因素對特定公共政策的選擇有不同的影響（Miller and Banaszak-Holl 2005）。因此，社會學者需要謹慎的判斷與國家最適當的合作情境。不分清紅皂白的做政策，或是完全的排斥，都不是作為關懷者的社會學家（a concerned sociologist）所應採取的立場。

六、官僚體制下的政策社會學運作

社會學從政策研究退縮，還有一些因素，特別是有關管理政策研究的官僚程序，這亦解釋了為何許多有興趣的社會學者望之卻步。首先，台灣的政策社會學通常受政府的資助，研究的過程受到政府單位的「督導」。「與官員打交道」，暗示研究的議題受到「政治空間」的限制，所提的政策建議通常需經過行政協商後才能提出，這是強調學術自主的社會學者不能容忍的情境之一（Rossi 1980）。¹²社會學者扮演的角色，常是Coleman（1978: 688）所謂的「第三者的代表」，明的是政策背後的大眾利益的化身，暗的是成為資助者——政府組織——的白手套。對於政策研究應如何進行，以何種方式呈現結果，這些組織自有一套理論。研

¹² 政府的行政作業程序繁雜，特別是經費報銷的要求綁手綁腳，耗費不少研究者的精力。進入官僚體系面對一個繁文縟節的組織，是研究者極不習慣的。這些問題，西方國家亦有，但是台灣似乎更為嚴重。

研究者的自主性受到愈大的限制，政策研究的價值愈低。

第二，官方提出政策研究的規劃要求不夠明確，研究者著手處理問題亦感到模糊，雙方面的「磨合」通常要費許多時間、精力。即使是在一些中央部會的單位，一些研究案的規劃，不少是由基層的科員擬出，當作一般的官僚作業層層上簽，其實質的社會改革意義付之闕如，交付給研究者的任務難以捉摸。

第三，大部分官方人員對於研究議題背後所牽涉的價值立場或分析邏輯並不熟悉，他們提出的要求，從研究者的觀點而言，常是枝微末節的技術性問題。研究者必須付出額外的耐心與努力，熟悉行政規則與事務。

第四，台灣的政策研究，常是「跑短線」的，公告期間極短（三週左右），給予研究者構思準備的期限更為壓縮。這些研究案通常要求在半年或九個月期間完成，我們可以想像參與研究者的時間壓力。我們可以推論一大部分的政策社會學研究是在「短跑衝刺」下完成的，沒有時間讓研究者像是哲學家皇帝那樣從容、全盤的思考。

第五，可能是最重要的，政策研究的商業化。政策研究目前採用公開招標的形式進行，研究者以「廠商」的名義與其他同儕「競標」。政策研究成爲一種市場交易。作爲研究者的廠商（或是化身爲廠商的研究者），事前準備的成本增加。而在多家競標所增加的不確定下，致使有想法、熟悉相關研究議題的研究者退怯。相較之下，一些有組織的大型研究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與支援，在短時間內可以組成一個團隊參與競標，組織規模可能決定誰來執行政策研究。另一種情況是，「內定」的研究者花費很少的成本，即可獲得研究機會。學界不乏這種案例，「內定」是違反公開招標的要求。幸運時，具有特殊關係網絡的研究者或許正好是特定領域的專門人才。不幸時，研究者以競標研究計畫爲主要工

作，以「企業家」的形式同時經營幾個研究案，以獲得研究費為主要的動機。這類的公共政策研究被「私人化」、「秘密化」(Horowitz 1968)，計畫主持人避免與同儕公開討論，將更多社群的意見廣泛納入，這樣的研究倫理大有爭議。

從經濟學霸權到國家與官僚的討論，彰顯的一個事實是，社會科學知識的運用是鑲嵌在一個制度化的設計中。那一個學門的社會科學可以佔據優勢的發言位置，成爲一種「可以利用的」知識，是一種社會建構的結果 (Shahidullah 1998)。而現時的制度設計，不論是一般政府行政與研考部門，國家資助研究的單位 (國家科學委員會)，甚至是我們自己的學術社群規範，對社會學的政策取向研究與知識的運用相當不利。而對於許多公共政策施行的「結果」，亦缺乏嚴謹的評估研究，政府將全部的公共政策經費分配到「投入」的部分，通常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制度化的撥出一部分來測量這些政策的「效用」或「產出」，作爲政策持續施行時的參考。而評估研究亦是政策社會學可以做出貢獻的地方。可以這麼說，台灣社會一方面缺乏一種有效的公共統理制度將社會 (科學) 研究納入政策的參考；另一方面，台灣的政策社會學長期的在較貧脊的學術土壤上成長，未能纍纍結果，它的潛在影響力也爲同儕所忽視，即使是針對實際社會問題進行研究 (例如教育、青少年的研究等)，也不夠積極的將研究結果拿來與實際政策進行對話。政策社會學這一個社會學領域的分枝，成爲人煙罕見之處，或許是可以理解，但絕不是關懷的社會學者應該要接受的。

七、新政策社會學的範型與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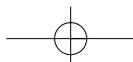
我們的社群應該更積極進行政策社會學的研究。正如同我一開始引

用 Durkheim 的話，社會學不能自滿於對社會事實能進行細緻的學理思考。不可否認的是，由於社會學界集體的努力，社會學在台灣社會科學社群中的聲望與地位已然確定。社會學社群擁有一種集體意識來支持「專業社會學」——社群念茲在茲的是供應社會生活的理論分析模型，累積更多經過檢證的知識，開發重要的問題意識。社會學界出版的重要社會學刊，包括《台灣社會學刊》、《台灣社會學》與《人口學刊》，成為社會科學界指標性的知識來源。在這些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者，是台灣的專業社會學的代表。但社會學社群是來自數十個大學與研究機構至少三百位積極從事社會學研究活動的會員，用這些刊物的成果來呈現我們的社會貢獻是不夠完整的。

追求社會學的專業化，社會學者給自己鍔上一把自我規訓的鎖鍊。對於實際問題的分析，我們太過疏離，對於解決這些問題的想法，我們太過輕忽。社會學的發展集中在專業社會學的「象限」上，我們的知識與實務之間不均衡的發展，致使我們這個以研究社會為使命的學科，很弔詭、也很可惜的在社會上的影響力消蝕，我們的研究方向加以調整是有必要的。

傳統型的政策研究者，在研究者的動機、與國家的互動、在自己社群中的地位等方面，遭遇許多限制與阻礙，致使這個領域的發展困頓不前。我們應努力克服這種不利的情境：在認知上，我們應了解社會學的工具性功能不必然與社會學（純）研究或價值判斷有不可共容的矛盾；在行動上，社會學家可以更積極的作為，跨越實證研究者的角色，在合理的理念基礎上，提出規範性的制度創新方向。

本文的目的是提出一種政策社會學的新範型，將政策研究以新的面貌、新的形式、新的地位，再帶入社會學的學術實踐中，我們的願景是社會學的影響力可以再顯著提升。新政策社會學的基本命題是：



1. 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體認社會政策相關的研究，具有實質的價值與意義，對於改變社會的制度運作，提升社會成員的福祉，具有實際的效用，它的重要性，應與其他象限的社會學相等。

2. 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成果，應得到社會學社群的尊敬與接納，不同的學術分工，自有其特定的研究功能。專業、批判、政策與公共社會學的劃分，僅是分工及概念上的便利，不應視分化、敵對、一較高下的競爭情境。這些功能性的差別，不應轉化成學術地位的階層差異。

3. 新政策社會學應尋求專業社會學的合作，或者，專業社會學者也應「兼顧」政策社會學。任何一種象限的社會學的獨大，都將消滅這門學科的社會影響力。缺乏其他象限的社會學的支持和參照，政策社會學不免淪為次等的地位。而新政策社會學，斷不能成為二流的社會學。

4. 新政策社會學的研究者，應更清楚了解自己所承擔的政治角色，避免成為特定政治或經濟利益的辯解者。新政策社會學應為自己代表的專業維持令人尊敬的地位，不能淪為政治精英的侍從者。新政策社會學也要拒絕成為政治控制的機制，政策社會學的研究過程應該更為民主化，將市民社會的異議思考帶入研究，進行理想的民主溝通，讓支持研究的案主能體會、知情的理解民間社會的另類意見。

5. 新政策社會學意謂著社會學枝葉的再擴張，關懷的社會學者應具備政策研究的技藝，¹³這意謂著社會學課程的專業訓練，對實際／應用取向課題，應有更開放、包容性的做法。

6. 新政策社會學與公共社會學的研究者應一起致力於擴張社會學的

¹³ 在瞿海源、蔡明哲、張家銘、曾熾芬與蔡明璋（1997）分析六個社會學系在1994至1996年間的課程，應用社會學與社會政策相關的課目是最少出現的。雖然較近的資訊闕如，情況亦應無太大的改變。美國大學社會系的開課情況亦同樣的不重視這種實務的知識與訓練（Wagenaar 2004）。

影響力，目前，公共社會學已經開頭做了先鋒。公共社會學應與政策社會學更緊密的合作，兩邊團結則巨大有力，單獨行動則事倍功半。雙管齊下是最佳的策略。

政策社會學補充專業社會學在價值與實踐面向上的不足，讓社會學能以更圓滿的方式，將社會學知識奉獻給社會的改革與進步。最後我要引用 Alvin Gouldner (1962: 205) 的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尾：

社會科學如果沒有付出，是不會完全被社會、或其一部分所接受，這意謂著對於當前人類的苦楚，它必須要展現出它的相干性與關懷心。

作者簡介

蔡明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是全球化與社會發展的議題。除了進行跨國量化的比較發展研究之外，他也分析台灣民眾與世界的互動模式。最近的一項政策性研究是關於新移民的支持政策。

參考書目

- 王振寰、章英華編，2005，《凝聚台灣生命力》。台北：巨流。
- 呂朝賢、王德睦、王仕圖，1999，〈年齡、時期、人口年輪與台灣的貧窮率〉。《人口學刊》20: 125-138。
- 林國明，2003，“Policy Sociology as Public Sociology: Personal Reflection upon Civic Participation Research in Taiwan.”《台灣社會學會通訊》53: 58-61。
- 林國明、陳東升，2003，〈公民會議與審議民主：全民健保的公民參與經驗〉。《台灣社會學》6: 61-118。
- 夏道平、馬凱、林全與吳惠林譯，1988，《自由經濟的魅力》。台北：天下文化。
- 張清富，1993，《台灣省貧窮趨勢與致貧因素之研究》。台北：豪峯。
- 陳正峰、王德睦、王仕圖、蔡勇美，1999，〈老人單身家戶、女性單親家戶與貧窮：嘉義縣低收入戶的貧窮歷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 526-561。
- 章英華、薛承泰、黃毅志，1996，《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兼論對技職教育改革的政策意涵》。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 葉啓政，2001，《社會學和本土化》。台北：巨流。
- 蔡明璋，1996，《台灣的貧窮——下層階級的結構分析》。台北：巨流。
- 蔡瑞明、林大森，2000，〈教育與勞力市場的連結：以台灣的教育分流為例〉。頁143-190，收錄於劉兆佳、尹寶珊、李明堃、黃紹倫編，《市場、階級與政治：變遷中的華人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亞太研究所。

蕭新煌，2002，《台灣社會文化典範的轉移》。台北：立緒。

瞿海源，2002，《針砭——瞿海源評論集》。台北：圓神。

瞿海源、蔡明哲、張家銘、曾熾芬、蔡明璋，1997，《社會學教學與台灣社會》。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報告。

譚康榮，2003，“Endangered Species? Public Sociology in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台灣社會學會通訊》53: 50-57。

蘇國賢，2004，〈社會學知識的社會生產：台灣社會學者的隱形學群〉。《台灣社會學》8: 133-192。

顧忠華，2005，〈論社會科學的開放性與公共性〉。《台灣社會學刊》35: 1-21。

Boyns, David and Jesse Fletcher, 1995, “Reflections on Public Sociology: Public Relations, Disciplinary Identity, and the Strong Program in Profess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st* 36: 5-26.

Brady, David, 2004, “Why Public Sociology May Fail.” *Social Forces* 82: 1629-1638.

Burawoy, Michael, 2005a, “For Public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0: 4-28.

_____, 2005b, “Third-Wave Sociology and the End of Pure Science.” *American Sociologist* 36: 152-165.

Calhoun, Craig, 2005, “The Promise of Public Soci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6: 355-363.

Coleman, James, 1978, “Sociological Analysis and Social Policy.” Pp. 677-703 in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 edited by Tom Bottomore and Robert Nisbet. New York: Basic Books.

- _____,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s95-s120.
- Durkheim, Emile, 1984, *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 Frank, Andre Gunder, 1969,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Press.
- Gouldner, Alvin, 1962, "Anti-Minotaur: The Myth of a Value-Free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9: 199-213.
- Gourevitch, Peter, 1986, *Politics in Hard Tim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130-1380.
- _____,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481-510.
- Habermas, Jürgen, 1970,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Boston: Beacon.
- Horowitz, Irving L., 1968, "Soci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An Examination fo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Research." Pp. 262-286 in *Professing Sociology: Studies in the Life Cycle of Social Science*. Chicago: Aldine.
- Marx, Karl, 1973, *Grundriss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Vintage.
- _____, [1848] 2000,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p. 245-271 in *Karl Marx: Selected Readings* (2nd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McLell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Edward A. and Jane Banaszak-Holl, 2005, "Cognitive and

- Normative Determinants of State Policymaking Behavior: Lessons from the 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Publius--The Journal of Federalism* 35: 191-216.
- Nisbet, Robert, 1978, 〈社會問題的研究〉。頁1-26，收錄於郭振羽、羅伊菲譯，《當代社會問題》。台北：國立編譯館。
- Polanyi, Karl, [1944] 1968,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 Rossi, Peter, 1980, “The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ies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 889-904.
- Rule, James, 1997, *Theory and Progress in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Pepper, 2005, “Sociology as Public Practice: Toward a Better Uti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Theor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8: 423-431.
- Shahidullah, Shahid M., 1998, “Useful Sociology: Can Sociology Knowledge Be Valuable in Policy-Ma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18: 86-112.
- Smart, Barry, 2003,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A Sociological Critique of Neo-liberalis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Trigilia, Carlo, 2002, *Economic Sociology: State, Market, and Society in Modern Capitalism*. London: Blackwell.
- Turner, Jonathan, 2005, “Is Public Sociology Such a Good Idea?” *American Sociologist* 36: 27-45.
- Wagenaar, Theodore, 2004, “Is There a Core in Sociology? Results from a Survey.” *Teaching Sociology* 32: 1-18.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4,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Weber, Max, 1949,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Free Press.